

中国古代文学史新编

熊 笃 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上



高等师范院校文科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史新编

(上册)

主 编 熊 笃

副主编 (以姓氏笔划为序)

何明新 董运庭 谢真元

重庆大学出版社

前 言

近十年来,随着对文学史观的研讨不断深入,文学史的编写也正在出现一个高潮。这是对长期以来文学史著作数量偏少、观念陈旧、方法单一、内容雷同的不正常现象的反拨。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来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著已百余部。其中,有通史,也有断代史、时期史;有文体史,也有流派史、创作史、思潮史。从写法上看,有详史、简史,也有长编、史论、史话,等等。仅就通史而言,马积高、黄钧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新著,都以其各具特色的开创,在学术界获得好评,它们作为高校文科的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已经或正在对教学改革发生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所有这些丰硕成果,都是对“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所作出的回答,不过,它们是探索的实绩,却不是探索的终结。

如何全景式地还原和再现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正确地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深刻地总结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是,如何面向 21 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适应高校教改“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的要求,写出一部适合教师教学操作、方便大学生自学、同时也能为专业研究者提供参考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著,应该说,仍然存在继续探索的必要。应该鼓励创新,以寻求全新的学术视角,从而实现对文学史整体把握的突破。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根据切身的体会,同时,也借鉴了近年来出版的有影响的文学史著的宝贵经验,我们认为,实

现对文学史的整体把握的突破,关键在于摸索一条宏观与微观、纵向与横向有效结合的新路子,借助若干中介,从外在走向内在,逐步摆脱对外在的社会历史框架的依赖,建立文学史自身的发展结构。具体说,则应做到两点:一、分期合理;二、体例科学。以往的文学史,完全按历代封建王朝的自然段落分期,缺乏必要的概括与归纳,使文学史在实际上成为封建王朝政治史的附庸,看不出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性。以往的文学史,也多半是作家作品史,无法多角度、全方位地透视文学思潮、文体文风流变的线索,以及文学兴衰承传的内在原因。有鉴于此,并结合古代文学课程分四个学期教学的实际情况,本书分为四篇:先秦两汉、魏晋至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每编设“总论”,宏观概括本阶段社会历史特点、文学的基本特征以及纵横内外的联系,归纳出文学发展的某些规律。“文学理论思潮”一章,我们认为应是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理论思潮之于创作实践关系紧密,它既是前段和本段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又对本段和后段的创作发生重大影响。同时,它也是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在文论上的反映,但又不宜像文学批评史那样以文论家为纲分节,而应以对创作影响较大的思潮为主,按每类思潮的观点线索为纲分节。“文风文体流变”一章,则按文体分类设计,重在勾画出每一文体的产生、发展及其风格流派的演变线索,以及演变的诸种原因。这两章都是以往文学史所没有的一种新构尝试。每编的“作家作品”均为两章,则以作家为纲,一个作家有多种文体也放在同一节述评,以便“窥见全人”。以上四章都在每节之下设小标题,节下每一大段落都注意提炼主题词,务使适于教学。“附录”则是本编重要的文献书目,包括古今(也适当收录海外的)重要研究书目,分“总论、总集”和“作家作品”两大部分,又各分若干细目。它具有简明目录和读书指南的作用,方便师生按目检索,同时,也显示出对每一阶段、每一文体、每个作家的研究历史的粗略线索。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主编提出全书的理论构想,并拟出详

细的编写提纲，经教研室全体同仁反复讨论修改，达成共识，付诸实施。正、副主编会议担负全书编写过程中的统筹与协调工作。具体的编写分工如下：

第一编“先秦两汉文学”：“总论”和第一、二章，何明新编写，并负责本编的组织和初审；第三、四章，鲜于煌编写。

第二编“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总论”和第一、三章，董运庭编写，并负责本编的组织和初审；第二、四章，熊建国编写。

第三编“宋辽金元文学”：“总论”和第一、二章，熊笃编写，并负责本编的组织和初审；第三章陈忻编写；第四章段庸生编写。

第四编“明清文学”：“总论”和第二、四章，谢真元编写，并负责本编的组织和初审；第一章王于飞编写；第三章段庸生编写。

本书各编的“附录”，均由熊笃编写，并负责全书组织和审订、修改。

书中广泛吸取了学术界不少宝贵的最新研究成果，限于篇幅无法一一注出，谨在此一并致谢。我们自知才疏学浅，而又不揣冒昧，刻意求新，舛误疏漏一定不少，诚请专家学者和各地同行不吝批评指正。

编者

1996年7月

目 录

第一编 先秦两汉文学

总 论	3
第一章 文学理论思想	15
第一节 儒家的文学理论思想	15
第二节 道家的文学理论思想	28
第三节 法家的文学理论思想	34
第四节 对屈原和楚骚评价的论争	40
第五节 王充的文学理论思想	46
第二章 文风文体流变	55
第一节 诗歌的渊源流变	55
第二节 散文的渊源流变	63
第三节 辞赋的渊源流变	70
第四节 神话的渊源流变	75
第五节 寓言的渊源流变	84
第三章 先秦作家作品	94
第一节 《诗经》	94
第二节 屈原与《楚辞》	102
第三节 史家之文(一)	111
第四节 史家之文(二)	118
第五节 诸子之文(一)	125
第六节 诸子之文(二)	140
第四章 两汉作家作品	146
第一节 西汉初期文学	146

第二节	西汉中期文学·····	154
第三节	司马迁及《史记》·····	160
第四节	西汉末东汉初期文学·····	173
第五节	东汉中后期文学·····	180
第六节	汉乐府民歌·····	185
第七节	古诗十九首·····	191
附 录	重要文献书目·····	194
一、	总论总集·····	194
二、	作家作品·····	197

第二编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总 论·····	213
第一章 文学理论思潮·····	223
第一节 进入独立自觉的文学思潮·····	223
第二节 追求艺术审美的文学思潮·····	229
第三节 探索文学形象的理论思潮·····	235
第四节 重风骨、兴寄、讽谕的诗论·····	241
第五节 古文运动及其理论主张·····	247
第二章 文风文体流变·····	254
第一节 诗歌的发展流变·····	254
第二节 散文的发展流变·····	262
第三节 辞赋的发展流变·····	267
第四节 小说变文的渊源流变·····	271
第五节 词的渊源流变·····	278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作家作品·····	283
第一节 建安文学·····	283
第二节 正始西晋文学·····	291
第三节 陶渊明·····	300

第四节	南朝宋文学·····	308
第五节	齐梁陈文学·····	314
第六节	北朝文学·····	321
第七节	民歌和小说·····	325
第四章	隋唐五代作家作品·····	332
第一节	隋及初唐诗人·····	332
第二节	王维、孟浩然等山水田园诗人·····	342
第三节	高适、岑参等边塞诗人·····	348
第四节	李白及其浪漫主义诗歌·····	352
第五节	杜甫及其现实主义诗歌·····	356
第六节	大历诗人·····	359
第七节	元白诗派·····	364
第八节	韩孟作家群·····	369
第九节	柳宗元、刘禹锡·····	376
第十节	杜牧、李商隐等晚唐作家·····	381
第十一节	唐传奇和变文·····	389
第十二节	五代词人·····	392
附 录	重要文献书目·····	396
一、	总论总集·····	396
二、	作家作品·····	402

第 一 编

先 秦 两 汉 文 学

总 论

中华民族是世界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早在 100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在这块土地上活动了，到四五十万年前的时候，他们的足迹已踏遍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长期繁衍生息、开拓劳作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劳动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文学产生于劳动，所以文学当在文字发明以前很久就已发源了。广义的先秦文学，有传说可征和文字可考的时间，大约也已有四千多年，加上两汉，时间更长。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分期中时间最长的一段，远远超过了以后各段时间的总和。历史的漫长和复杂决定了文学的特殊面貌与发展轨迹。

一、先秦两汉历史的特点

先秦两汉包括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三种社会形态、三段文明时期。原始社会大约从太古到传说中的尧、舜时代，时间最为漫长；奴隶制社会大约从夏朝至西周，历夏、商、西周三朝，约 1300 多年；封建社会从春秋时期开始孕育，战国过渡完毕，至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大致发展完善，历时 960 多年。这段历史时间长，变化大，内容丰富，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上古众多的种族、氏族、部落逐渐融合，最后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从迄今考古发掘出的古人类化石看，猿人遍布于中华大地，200 万年前有长江流域的巫山猿人，170 万年前有云南元谋人，150 万年前有黄河流域的蓝田人，50 万年前有北京人，更后来有珠江流域的马坝人，再向后有河套人、长阳人、丁村人、资阳人等等。中国人这些祖先，在绵渺漫长的时代里，创造出了辉煌的文化，石器、陶器、骨器、纺器、村落、壕堑、公墓，以及多达几

十种的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形的原始文字，在距今 8000 年前就已出现，器具和文字都已制作得相当精美了。祖先们繁衍到石器时代，也就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经过长期汇聚融合，开始形成了以主宰中原地区的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华夏民族大致经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夏禹，进入有实物实证和文字记载的商、周。华夏族的文明发展水平最高，他们称周边各民族为蛮夷，或者夷狄，或者戎狄。进入周代以后，华夏族与四周其他民族文明的交流增加，加速了民族融合，华夏族所融汇的族类越来越多，所占地域越来越宽广，为秦、汉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奠定了良好基础。政治上的统一又进一步促进了民族的融合，秦汉时期不仅先前杂居在中原的一些戎狄部族成了华夏族，而且远在边陲的西南夷、南方百越、西北和西域等地的部族，也逐渐接受了华夏族国家政权的统领。历经 400 年的两汉，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

第二，社会矛盾复杂尖锐，战争频繁，民族和国家由分裂对抗逐渐走向统一。上古氏族集团众多，生产力水平低，物资缺乏，人们生活艰苦，为争夺生活资料和活动区域，氏族之间，由氏族组合成的部族集团与部族集团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传说时代的黄帝与炎帝、黄帝与蚩尤、尧时尧舜与共工、驩兜、三苗的战争等等，都是规模巨大的武装冲突。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战争往往带上了阶级斗争或社会新旧势力对抗矛盾的性质。夏朝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开端，禹死后，有扈氏和禹之子启为争夺政权就在甘地展开了一场大战。以后改朝换代和争权夺利的战争不绝于书。商代夏、周代商都是运用战争实现的。此外，还有华夏政权与夷狄之间的民族战争。到了东周，由于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奴隶制生产关系被逐渐突破，井田制瓦解，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开始产生。在这新旧社会制度消长的时期，各阶级、阶层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利益重新调整分配，因而社会动荡混乱，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新旧社会力量的较量斗

争,集中反映在各诸侯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无休无止,和诸侯国之间掠地争霸的战争接连不断,几乎是国无宁日,家无宁日。到了战国,经过各诸侯国先后陆续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开始确立,初步完成了社会形态的转化。但是封建经济要获得充分发展,必须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新的社会制度要巩固完善,需要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而当时的社会状况是:王纲解纽,周天子名存实亡,诸侯各自为政,现实与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存在尖锐矛盾。于是在学术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场关于社会发展和天下统一的大讨论,这就是所谓百家争鸣。尽管当时对于统一天下的主张各式各样,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一类主张武力兼并,法家的理论最有代表性,另一类主张道义感化,儒家的仁政王道政治最典型。为了各自的切身利益,谁也不愿平毁自垒的山头,只希望越垒越高,各诸侯国君当然不会接受道义感化那一套,而会对武力征服感兴趣。韩非剖析非常深刻:“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这就是战国时期兼并战争不可避免的社会历史原因。战国兼并战争,既给当时广大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又为天下走向统一创造了条件,经过混战和兼并,剩下七雄。七雄纷争,六国先后灭亡,最后由秦实现了统一。汉承秦制,继承和发展了秦朝所开创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制度,为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定下了基本格局。

第三,本时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从产生到全面奠定基础的时期。我国古代精神文化产生非常久远,从地下发掘出的大量的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石器、骨器、陶器的精美形制和图案花纹证明,在距今七八千年以前,其发展程度就已相当高了。进入用书面文字记事的殷商西周,流传至今的文献典籍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周易》经文和《尚书》中的大部分篇章,此外还有《诗经》中的部分诗篇。这些典籍反映了上古社会多方面的情况 and 政治、哲学、刑法、文教等方面的思想。这些思想中贯串着两点重要精神,即“敬天”和

“尚德”。“敬天”思想一方面是原始宗教迷信观念的遗留，另一方面乃导源于当时人们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相互依存关系的初浅理解。“尚德”是对原始社会民主平等思想的发展。这两种思想对传统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到春秋战国，古代文化出现了第一次大繁荣，以儒、墨、道、法、纵横等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各自都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伦理道德、文教等思想在内的完整的社会学说，将社会人文理性水平提到一个新高度。春秋战国文化丰富多彩，各派的思想观念自然多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此时期文化有以下几个特征：（1）天人和谐的宇宙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左传》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公六年）孟轲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周易·大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序卦》）《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墨子》说：“计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上同于天。”（《尚同下》）以上所引言论，虽然具体意思各不相同，但所表现出的关于天人关系的观点则有共同之点。即认为天人是和谐的，或应是和谐的。（2）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儒家这种思想最突出。《论语》载孔子认为如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统治者，德行修养就已达到“仁”和“圣”的境界了。（《雍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离娄上》）的主张，全书充满着支持人民反抗暴政的言论。荀子提出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观点。道家也不乏民本思想。《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49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75章）墨家也主张治国以爱

民、惠民为本。墨翟说百姓“苦于厚作敛”，“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墨子·辞过》）；并说爱人是符合天道的，“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贱人者，天必祸之”（《墨子·法仪》）。这些民本思想中往往包含着原始的民主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3）“大同”的社会理想。如老子的“小国寡民”，庄子的“至德之世”，墨子的“兼爱”、“非攻”、“尚同”，农家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饷飧而治”，孟子的“王道”，特别是《礼记·礼运》中表现出的孔子的大同理想，将古人这种美好的愿望表达得十分完整。（4）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念。儒家不以物质财富的多寡，而以仁义等德行修养的高低区分人的贤与不肖。道家不以爵禄名利，而以清心寡欲，顺心自适作为衡量人高下的标准。墨家以爱人利人、躬俭勤勉为做人的准则。他们的相同点都是把一定的思想道德的精神追求作为人生态理想的主要目标，将物质生活享受摆在次要地位。（5）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君子意识。当时百家的代表人物都有一腔匡时济世的宏愿，对社会都怀着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他们的学说都是治理社会的药方。孔子鉴于礼崩乐坏，周游列国，整理“六经”，力图恢复西周的王道政治。老庄认为圣人出，大道毁，所以提出“绝圣弃智”、“无为而治”的治国主张。最典型的要算孟子“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言论，这种视治天下为自己理所当然之事的认识和自信精神，充分反映出当时士人那种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对自身价值的高度评价。此外，在墨家、道家、农家的言行中，还有反对剥削、压迫、侵略，追求自由的思想。以上这些文化思想，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降及秦汉，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秦奉法家为一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术自由的时代从此结束。经过董仲舒和其他汉儒加进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内容，将先秦儒学加以改造，定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从此，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都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法家思想的有关内容，作

为统治思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先秦至两汉,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全面奠定基础、确定基本格局、规范发展方向的重要时期,对其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二、先秦两汉文学的基本特征

先秦两汉是我国古代文学由发生、发展,到走向初步繁荣的时期,时间长,社会变化大,情况复杂,因此,文学呈现出阶段性、多样性的特点。它不同于后世文学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第一,紧贴现实人生,理性精神强。文学是上古人类劳动的产物,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一开始就是直接为劳动生活服务的,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开始摆脱了原始巫术宗教和天命论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执著于对社会现实生活中种种问题的观察思索。这种实践理性精神几乎贯串于人们活动的一切领域,自然也成为人们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秦汉之际的社会风云变幻,使传统的世袭制、等级制和“王侯将相有种”的血统论,发生了动摇,人文理性精神得到了大大张扬。

先秦两汉的文学作品分为诗、文和赋三大类。诗和文的运用最初都以实用为主,诗用于祭祀、庆典、宴宾、外交活动,文用于记事、议政,发布政令等,基本上是一些宗教性、历史性和政治性的文献。《诗经》中《雅》《颂》的一部分作品,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周易》、《尚书》,都是例证。后来的诸子散文均是为议论国家政治和社会人生而作,历史散文也是记载政事和总结治国的经验教训的作品。战国诗歌“楚辞”,一部分是祭歌,一部分是发泄政治情绪的篇章。秦汉散文分为政论、史传、杂体三大类,政论属应用文自不消说,史传散文也主要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歌颂封建统治者,总结统治经验,以书信为主的杂体散文,多为人际交往的应用文。以乐府诗为主的汉代诗歌,自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直

叙生活遭遇的作品。汉代出现的新文体——赋，也是为适应“润色鸿业”，赞颂繁荣向上的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主要还不是为了娱乐身心。总之，先秦两汉文学是以表现人们在国家政治、社会人生中的实际活动为主的文学。关心天下大事，放眼国计民生这一创作方向，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的一种优良传统。

第二，民间文学和文人著作并驾齐驱，交相辉映。文学产生于劳动，自然也产生于劳动人民。上古歌谣和神话，是劳动者自己的创作。《诗经》和《楚辞》这两座诗歌史上的丰碑，一以民歌为主，一为在学习民歌基础上的文人之作。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虽属文人作品，但他们所取得的出色成就也与向民间文学学习分不开。民间故事、寓言、民间文学样式（如说唱文学）以及民谚、民谣、俗语等等，都被他们吸收、采用，成为他们作品的重要养分，或被借用为形式。秦汉诗歌仍明显分为民歌和文人诗两部分，民歌中的乐府诗在当时的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似乎都在文人诗之上。散文基本上为文人创作，但不少作家也注意从人民群众中吸收创作营养，或从民间获取素材，或向群众学习语言。如《史记》，作者除查阅大量文献史料外，还走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深入下层民间，询访遗贤故老，了解流传在民间的古今人事遗闻，正由于将文献资料和现实社会中活的史料相结合，互相参证，互相补充，才使这本书的文学和史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史记》的语言是大众口语的提炼，是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完美结合。《史记》成为古代史学和文学殿堂中的珍品，与司马迁善于向民间学习不无关系。

先秦两汉文学，韵文部分以民间创作为多，成就大；散文和赋主要是文人作品，成就也显著。《诗》《骚》是诗歌的典范，《史记》是散文的典范，汉赋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文学，影响深远，它们都对后世文学沾溉遥深，衣被百代。但先秦时作家多无名氏，专书多几人合著，不仅《诗经》中绝大部分诗作不知作者，就是《国语》、《左传》和《战国策》等书史的作者也难以确定，诸子众书也大都为多人共